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端	(1)
第一节 鸦片战争前夕的中国和世界	(1)
第二节 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	(5)
第三节 中华民族的觉醒与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和历史任务	(14)
第二章 旧式农民运动与封建王朝的自救	(18)
第一节 太平天国起义与农民运动风暴的起落	(18)
第二节 清政府的自强运动	(27)
第三章 资产阶级的改良与革命	(31)
第一节 近代新兴阶级的形成与救亡图存的探索	(31)
第二节 资产阶级的维新运动	(36)
第三节 辛亥革命与中华民国的成立	(41)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57)
第一节 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萌芽和传播	(57)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64)
第三节 国共合作和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67)
第五章 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探索与曲折	(82)
第一节 国民党在全国反动统治的建立	(82)
第二节 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探索	(87)
第三节 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曲折	(91)
第四节 总结历史经验和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96)
第六章 全民族的抗日战争	(102)
第一节 全国抗战的开始	(102)
第二节 坚持团结抗战 反对分裂投降	(106)



第三节	日本帝国主义在沦陷区的统治和掠夺	(115)
第四节	抗日战争的胜利	(118)
第七章	人民解放战争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124)
第一节	人民解放战争的爆发	(124)
第二节	第二条战线的形成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	(129)
第三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135)
第八章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	(142)
第一节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	(142)
第二节	社会主义的过渡	(150)
第三节	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	(155)
第九章	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	(163)
第一节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开端	(163)
第二节	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中的曲折	(167)
第三节	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成就	(177)
第十章	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与开辟	(184)
第一节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开创	(184)
第二节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	(195)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阶段	(203)
参考文献		(217)



第一章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端



第一节 鸦片战争前夕的中国和世界

一、清朝统治的衰落

清王朝的统治,从建立到灭亡(1644—1911)经历了十个帝王二百六十多年的风风雨雨,到鸦片战争前夕,已经问题重重。

1. 官僚政治的总体性腐败

“各省督抚中洁身自爱者,不过十之二三;而防闲自竣者,亦恐不一而足”^①。自18世纪下半叶开始,清王朝已开始出现严重的政治腐败,大小官吏贪风盛行,营私舞弊,贿赂公行。“权不重则气不振,气不振则偷,偷则敝”(《龚自珍全集》,第35页)。各级官吏层层剥削,最终都得从百姓头上搜刮。“督抚司道等则取之州县,州县则取之百姓,层层胶削,无非苦累良民,罄竭膏脂,破家荡产”^②。因循苟合,百务废弛,要政尽坏:漕运、盐政、河工、钱粮(赋税)额。军队腐化,武备废弛。

2. 人口过剩与社会问题

清代人口在1741—1840年的100年间,连续突破2亿、3亿、4亿大关,到咸丰元年(1851)中国人口已达4.3亿,110年间增长了2.9亿,超过以往所有历史时期的增长总量,年均增长率高达1%。人口的急剧膨胀,导致资源与人口比例的严重失调。据统计,乾隆十八年(1753)全国人均占有耕地约4亩,以后逐年递减,乾隆三十一年(1766)为3.75亩,嘉庆十七年(1812)为2.36亩,道光二年(1822)为2.03亩,到咸丰元年仅1.75亩。据当时

^①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三联书店出版社,1957年版,第53页。

^② 《清仁宗实录》,中华书局出版社,1985年版,第75页。



生产力水平“一人一岁之食，约得四亩”(1745—1809)来推断，则大致从乾隆十八年(1753)人口开始过剩。

人口过剩与小农经济“过密化增长”的可能，导致社会整体生产效率的持续下滑。人民生活贫困，经济发展停滞，灾祸不断，出现人口过剩与流民现象，社会动荡，民生日蹙，民变四起。从嘉庆元年(1796)至道光二十年(1840)的45年间，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就有十余起。

3. 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

闭关锁国、拒绝交流是清廷对外关系的基本政策。康乾时期是人类历史从分散走向整体的时代，是经济国际化趋势日渐明显的时代。中国在对外关系上却采取了逆时代大潮的封闭国策。对外政策的着眼点是怀柔远人，外夷归附，宣扬恩德以保持国内秩序的稳定。至于航海探险、远洋贸易、对外扩张，则既缺少实行的手段、能力，也没有试探的兴趣。它不重视对外贸易的经济利益，只把通商当做怀柔的手段。当英国商人在给清朝的文书中要求扩大通商，声称中英通商“与天朝有益”时，乾隆皇帝谕令两广总督苏昌：“国家四海之大，何所不有，所以准通洋船者，特系怀柔远人之道。乃该夷来文内，有与天朝有益之语。该督等不但当行文笼统驳飭，并宜明切晓谕，使知来广贸易实为夷众有益起见，天朝并不藉此些微远物也。”^①他在给英王乔治三世的一封信中讲：“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②清王朝的对外政策就是建立在这种“天朝上邦”意识和传统的自然经济观念以及诸如“不宝远物，则远人格”之类的儒家经典之上的。因而，贸易变成了“怀柔遐方，加惠四夷”的政治行为，而并非将其视为经济发展的需要。它盲目坚持“天朝”体制，以“四夷之共主”的面貌出现，在国际关系中，既不考虑交往的平等性，拘泥于“三跪九叩”之类礼仪末节；也不考虑经济利益，用朝贡代替国际贸易。

对外关系的着眼点决定了对外交往的排斥态度。当西方竭力寻找新航线，拓展海外殖民地，大力发展海外贸易之际，清统治者正在为海岸线的不宁而焦躁不安。对于远道涉洋而来的西方国家，莫不以“夷狄”视之，把构筑一道坚实而绵密的藩篱，将最危险的西洋人隔绝于国门之外视为基本国策。康熙初年一度开放海禁，允许沿海居民出海贸易，但是，又决定不准外国人来华贸易。按传统做法，只有在外国人对华“朝贡期”内允许贸易，期限一过，即停其贸易，贡使便打道回国。外国人在贡期外从事贸易，康熙初年只有两次。康熙五年(1666)时宣布：下不为例，永行停止。康熙的这项政策，影响了清朝100多年，其后世子孙

^① 《清高宗实录》卷六四九。

^② 《粤海关志》卷二三。



顽固地坚持不准外国人来华贸易,贻误了中国的发展。清朝对对外交流进行严厉限制,首先对出口商品有严格限制。军器、火药、硝磺、铜铁可以制造武器,均在严禁之列;米麦、杂粮、马匹因内地缺少,亦禁出口;书籍则可能泄露中国状况,也不许运往国外。中国本来能制造巨大的帆船,出航远洋。到康乾时期,世界各国的航海业突飞猛进,船只越造越大,而清廷却规定:“如有打造双桅五百石以上违式船只出海者,不论官兵民人,俱发边卫充军。”^①对于出洋的水手、客商,防范极严,“各给腰牌,刻明姓名、年貌、籍贯,庶巡哨官兵易于稽查”^②。中国人到外国贸易,立定年限回国,如逾期不归,永远不许返回,即使三世居于外国的华侨,也要设法招回治罪并株连其家属。这种以天朝大国自居,采取不与西方通商的闭关锁国政策,完全堵塞了可能给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提供外部刺激的渠道。

4. 轻视和蔑视科技之风

在儒家思想的统治下,终清一朝弥漫着轻视和蔑视科技之风,把科技知识视为“形而下”,把发明创造称为“奇技淫巧”。清初的戴梓发明火器“连珠铳”,一次可填发 28 发子弹,又造出蟠肠枪和威远将军炮,然而清统治者抱着“骑射乃满洲根本”的思想,不仅不采用,反而听信谗言,将戴梓充军关外。1792 年,英特使马戛尔尼送给乾隆 80 寿辰的礼物中,有地球仪、地球仪、西瓜大炮、铜炮、各种自来火炮、西洋船模型、望远镜等 29 种,清廷只是将之作为“贡品”、“玩好”收藏,予以玩赏或鄙薄,根本未想到这里的科技含义及其中的军事价值。马戛尔尼曾邀请清军将领福康安检阅英国使团卫队演习新式武器操练,福康安竟拒绝说:“看亦可,不看亦可。这火器操作,谅来没有什么稀奇。”康熙帝对自然科学怀有浓厚的兴趣,宫廷中罗致了许多懂科学的耶稣会传教士,聘请了一批数学家研究天文、数学。但是西方科学未跨出宫廷一步,只供皇帝个人欣赏。雍正、乾隆两位皇帝对自然科学均无爱好,加以康熙末年由于礼仪之争,罗马教廷与清朝的关系破裂,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彻底阻滞了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传入和交流。

二、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殖民扩张

1. 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

资本主义的诞生使人类的物质生产能力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1848 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资本主义在不到 100 年的时间内“所创造的生产力大于前期人类所创造的生产力的总和”。以工业革命为基础的三次世界现代化

^① 《大清会典事例》卷七七八,康熙二十三年。

^② 《清朝文献通考》卷三三。



浪潮,推动着人类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进入现代工业社会。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建立资产阶级政权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最早进行和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从1770年到1841年的70年间,英国棉纺织业用棉量增加了一百倍。据统计,1820年英国工业生产量占世界工业生产总额的50%,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8%。1840年,英国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的25%,英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规模最大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家。

2. 资本主义殖民扩张

1640年,英国开始了资产阶级革命;美国1775年进行了独立战争;法国1789年爆发了大革命。意大利从1859年进行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俄国从1861年废除农奴制,日本从1868年实施明治维新,它们也都不约而同地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这些革命,不论胜利与否、彻底与否,其结果都加速了封建专制统治的灭亡,推动了民主政体的建立,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道路。

虽然资本主义的诞生使人类的物质生产能力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始终伴随着暴力和掠夺。“掠夺是一切资产阶级的生存原则。”^①“资本主义如果不经常扩大其统治范围,如果不开发新的地方并把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入世界经济的漩涡之中,它就不能存在和发展。”^②地理大发现后,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陆续东来的西方人先后占据了中国的国家,逐步向中国逼近。西方人来到中国的周围,可以合法地或者非法地在中国沿海的某些区域活动,但是他们要跨进中华帝国沉沉的大门却往往很难。

从清朝建立到1816年的一百多年里,西方的使节抵达北京,要求通商传教不下十数次。在他们的背后,是成百上千、成千上万的商人和传教士。两个世纪就是这样过去的。^③

“中西关系是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④

英国是一个最老牌的殖民国家,它的殖民地遍及世界,从西方到东方,被称为“日不落帝国”。1588年英国联合尼德兰击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17世纪取代了荷兰的海上地位(海上霸权),18世纪打败法国。1498年达·伽马打开东方航路,1591年英国人沿着达·伽马的故道抵达马六甲、苏门答腊等地,开始了对东方殖民地的扩张。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1页。

②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2页。

③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④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第9页。



总的看来,鸦片战争前夕,世界资本主义已经有了较大发展,这一方面大大提高了生产力,另一方面也大大加剧了殖民掠夺。资本主义越发展,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原料、市场等就越不能满足需要,就要不断掠夺原料,倾销商品,中国自然成为它们进攻的目标。



第二节 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

一、军事侵略

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势力对中国的侵略和本国封建主义势力对人民的压迫,是近代中国落后、贫困的根本原因。

1. 发动侵略战争,屠杀中国人民

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首先和主要的是进行军事侵略。它们依仗先进的武器和军事技术,或者进行武力威胁,或者发动侵略战争,或者武装干涉中国的内政,直到直接出兵镇压中国革命。这种军事侵略是逐步升级的,从骚扰、蚕食中国沿海、边疆,到割占中国大片领土,直到企图瓜分全中国。

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侵华战争。在1840年至1919年的80年间,较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就有十多次,几乎每隔几年就有一次,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几次:

(1) 第一次鸦片战争

1840年到1842年的鸦片战争,是由英国发动的。战争中,广大爱国官兵和以三元里人民为代表的爱国群众与侵略者进行了英勇战斗。但由于清政府奉行妥协方针,最终导致战争的失败。1842年,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中英《南京条约》,中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开始遭到破坏,从封建社会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战争中,一些爱国的知识分子惊醒了,一股“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萌发了。

(2) 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6—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是英、法为了扩大侵略权益而发动的侵华战争。美、俄坐收渔人之利。四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使中国丧失了更多的领土和主权,外国侵略势力扩大到沿海各省和长江中下游地区。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了。

(3) 中法战争



中法战争又称清法战争,是发生于1884年到1885年间清政府与法国之间的战争。除了主战场的中越国境外,法军也攻打基隆、淡水,封锁台湾海峡,并占领澎湖,当时的台湾居民称这场战争为“西仔反”。这场战争分为前期陆战、马尾海战和后期陆战三个阶段。对阵双方是清政府的福建水师和天地会黑旗军与法国的远征舰队和陆上部队。停火后,1885年6月9日,李鸿章与法国公使签订了《中法新约》(即《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十款》)。这场战争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充分暴露了侵略者的无耻和清政府的无能。战争结束后,清政府意识到了海军的重要性,正式成立了北洋舰队。

(4)中日甲午战争

中日甲午战争是1894年到1895年中国军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争。因1894年为农历甲午年,所以这场战争史称“甲午战争”。早在日军占领辽东半岛后,清廷便开始通过外交途径向日本请和。威海卫失陷后,清廷求和之心更切,遂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赴日议和。4月17日,中日《马关条约》签字,甲午战争结束。日军未经直隶平原决战便达到了预期的侵略目的。

(5)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八国联军是指1900年(庚子年)以军事行动进入中国的英、法、德、俄、美、日、意、奥的八国联合军队,总人数约3万人。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以清政府被迫与总共11个国家签订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结束,其中规定清政府赔款白银4亿5千万两,分39年付清,被称为“庚子赔款”。在战争中,俄国出兵侵占中国东北全境,这也为日后的日俄战争埋下了伏笔。

在历次侵华战争中,外国侵略者屠杀了大批中国人民。例如,甲午战争中,1894年11月日军攻陷旅顺后,即制造了“旅顺大屠杀惨案”。他们在4天内连续屠杀中国居民约2万人。1900年8月,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仅在庄王府一处,就烧死和杀死义和团团民和平民1700多人。有一队侵略军竟把一群中国居民逼到一个死胡同内,用机关枪扫射,“直到不留一个人为止”。1900年俄国入侵中国东北时,制造了“江东六十四屯惨案”。沙俄军警把中国人居住的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

2. 侵占中国领土,划分势力范围

每一次战争之后,资本—帝国主义列强都迫使中国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攫取在中国的经济、政治特权,劫掠中国的财富,破坏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这类不平等条约达数十个。如果再加上它们用武力或欺诈手段强迫中国政府签订的其他各种不平等的条约、条款、条规、协定、章程、合同等,总数达几百个之多。



影响较大的不平等条约

	《南京条约》	《天津条约》 《北京条约》	《马关条约》	《辛丑条约》
割地	香港岛	九龙司	辽东半岛,台湾及附属岛屿、澎湖列岛	——
赔款	2 100 万两白银	1 800 万两白银	2 亿两白银	本息共计 9.82 亿两白银
开放口岸	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	南京、天津等 11 处	沙市、重庆、苏州、杭州	——
关税	协定关税	2.5% 的子口税	免内地税	产品运销中国内地时,只按进口货纳税
其他权益	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	外国公使进驻北京;外国人可以到内地游历、经商、传教	允许日本在中国通商口岸开设工厂	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东交民巷设立使馆界;永远禁止中国人民成立或加入任何反帝组织;设外务部

在外国侵略者的压迫和蹂躏下,中国已经没有独立的领土主权可言。“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这是当时爱国志士发出的悲愤呐喊。

3. 勒索赔款,抢掠财富

帝国主义列强发动战争来侵略中国、屠杀中国人民,却要中国人民加倍地承担其战争费用。它们向中国勒索巨额赔款,造成中国严重的财政危机,直接破坏和阻碍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比如,在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侵略者就强迫清朝地方政府交纳广州赎城费 600 万两白银。战后,更通过《南京条约》攫取赔款 2 100 万两白银。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果是,英、法各得赔款 800 万两白银。甲午战争后,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强迫中国赔款 2 亿两白银,再加上赎辽费 3 000 万两,威海卫日军守备费 150 万两,共 23 150 万两,相当于清政府三年多的财政收入。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结束后签订的《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应支付的赔款额竟高达 4.5 亿两白银,分 39 年还清,本息合计近 10 亿两之巨。这种赔款是外国侵略者对中国实行的公开掠夺。

不仅如此,帝国主义侵略者在侵华战争中还公开抢劫中国的财富和珍宝,肆意破坏中国的文物和古迹。1860 年 10 月,英法联军攻进北京城前,首先抢劫和焚烧了清朝皇帝的离宫圆明园。他们进园后就大肆抢劫金银珠宝、瓷器绸缎、文物古籍,拿不了的就加以毁坏,最后还放火焚烧了圆明园和附近香山、万寿山、玉泉山的殿阁建筑。参加抢劫的英国军官



戈登承认：“我们就这样以最野蛮的方式摧毁了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

1900年8月，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皇宫以及北海、中南海、颐和园等禁苑里的无数金银财宝、珍贵文物古籍遭到他们的肆意劫掠。日本侵略军还从户部银库掠去300万两库银。^①

这些自称“西方文明传播者”的侵略者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充分地暴露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势力的不文明的野蛮的本性。

二、政治控制

为了统治中国，帝国主义列强在政治上采取的主要方式，是控制中国政府，操纵中国的内政、外交，把中国当权者变成自己的代理人和驯服工具。

1. 控制中国的内政、外交

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政治的控制是逐步实现的。

在鸦片战争时期，外国侵略者还只是通过中国内部的妥协派贵族大臣如琦善、耆英、伊里布等人，来对清政府施加压力和影响。清王朝统治集团中不少权贵大臣仍对外国侵略者抱有疑虑、恐惧乃至敌对的态度。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采取又打又拉的手段，在强迫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同时，表示愿意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终于使清政府基本屈服。

《天津条约》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允许外国公使常驻北京。实际上，当时西方列强的公使，是以战胜者的姿态进入北京的，他们不是普通的外交官，而是清政府的“太上皇”。美国公使田贝说过，他们经常教训清政府的大臣，什么事要做，什么事一定不许做。这就是说，外国公使可以在北京直接向中国政府发号施令。

在外国公使驻京前后，中国发生了一场宫廷政变，即“北京政变”（又称“辛酉政变”），对外国侵略者持强硬态度的肃顺等大臣被清除，恭亲王奕訢和慈禧太后掌握政权。奕訢等人由于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与列强进行交涉并签订卖国条约而受到侵略者的赏识。^②

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还享有领事裁判权。1843年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规定，在通商口岸，中国人如与英侨“遇有交涉诉讼”，英国领事有“查察”、“听诉”之权，“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照办”。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更规定领事裁判

^① 八国联军总司令、德国元帅瓦德西供认：“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坏之损失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

^② 英国公使普鲁斯向政府报告说：“其表现最可能和外国人维持友好关系的那些政治家掌握政权了。”“在北京建立了令人满意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已成为这个政府的顾问。”



权的范围,即所有美国人在华之一切民事、刑事诉讼,“均由本国领事等官询明办理”。从此,外国人可以在中国横行不法,中国政府却无权干预。

把持中国海关,是外国侵略者控制中国政治的重要手段之一。近代中国海关的职权范围,除了征收进出口关税外,还管理港口,主办邮政,甚至涉及与外国人交涉的各种事务。中国海关的高级职员全部由外国人充任。海关总税务司俨然成了清朝中央政府的最高顾问,而各通商口岸的海关税务司则成了各地地方政府的高级顾问。由于他们的任期长、熟悉中国情况,因而往往比外交官所起的作用还要大。英国人赫德自 1863 年任总税务司开始,直到 1908 年回国,掌握中国海关大权达 40 余年之久。他曾向清政府提出所谓“局外旁观论”,教训中国政府必须遵守不平等条约。他还帮助英国诱迫李鸿章签订《烟台条约》。中法战争期间,他指使其亲信英籍海关税务司金登干充当中国政府专使,到巴黎与法国签订和约。其后,金登干又代表清政府到里斯本与葡萄牙当局签订《中葡会议草约》。在关于《辛丑条约》的谈判中,赫德起过重要的作用。

2. 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

帝国主义列强还勾结清政府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和爱国运动。为了镇压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他们不但向清政府供应军火、船只,而且派外国军官指挥“洋枪队”,甚至直接动用陆、海军,对太平军作战。当中国人民掀起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即发生所谓“教案”时,外国侵略者指使清政府屠杀中国人民,惩办对人民镇压不力的地方官员。如 1870 年发生“天津教案”后,法、英等国军舰聚集天津进行军事恫吓,迫使清政府判处 20 名民众死刑,流放天津地方官吏 25 人。1899 年,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兴起后,美国公使康格公开要求清政府派所谓“强有力”的人物袁世凯去山东进行镇压。袁世凯升任山东巡抚后,立即采取血腥手段屠杀义和团团民。1901 年签订的《辛丑条约》中,帝国主义列强还强迫清政府作出永远禁止中国人成立或加入任何反帝组织的承诺,并规定清政府各级官员如对人民反帝斗争“弹压惩办”不力,“即行革职,永不叙用”。

3. 扶植、收买代理人

为了控制中国的政治,把中国政府变成自己的驯服工具,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注意在中国政府中扶植、收买自己的代理人。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得到列强支持的奕訢、文祥等满族贵族掌握了负责对外交涉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中外勾结共同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他们又扶植曾国藩、李鸿章等湘系、淮系军阀,并帮助他们购买、制造洋枪、洋炮和练兵、办军事工业。这些洋务派大官僚后来分别担任南洋大臣、北洋大臣及各地总督、巡抚,掌握地方的军政大权,实行媚外、妥



协方针。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在《辛丑条约》签订后,甚至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清末,帝国主义列强看中握有军权的袁世凯,支持他篡夺辛亥革命的果实,建立北洋军阀政权。袁世凯死后,又分别扶植皖系军阀段祺瑞、直系军阀冯国璋、奉系军阀张作霖等各派系军阀首领作为自己的代理人,支持他们割据地盘并挑拨离间使其进行混战。

三、经济掠夺

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方式,主要是商品倾销与资本输出。它们在用军舰、大炮打开中国的大门之后,利用其强迫清政府与之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赋予的特权,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开始把中国卷入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

1. 控制中国的通商口岸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只允许外国商人在广州一地贸易,而且必须经过官方指定的公行即“十三行”进行。1842年《南京条约》规定,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5个港口城市为通商口岸。1858年《天津条约》又规定,开放南京、九江、汉口等10个口岸。1860年《北京条约》又规定增加开放天津为通商口岸。陆路方面,还向俄国开放伊犁、喀什噶尔等商埠。在这些通商口岸里,外国人依仗不平等条约享有种种特权,控制当地的工商、金融事业,甚至设立租界,实行殖民统治。这些通商口岸大多成了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基地。

2. 剥夺中国的关税自主权

关税自主权是国家重要的经济主权。《南京条约》却规定,英国商人进出口货物的税率,要由中英两国“秉公议定则例”,这就开了所谓“协定关税”的恶例,使中国丧失了海关自主权。1843年制定的《协定税则》,竟把进口税率压低到“值百抽五”,即5%左右。1858年的《天津条约》还规定,外国商船可以自由在各通商口岸转口,而不需要重新课税。洋货只需在海关交纳2.5%的子口税,就可以在中国内地通行无阻,不必像中国商品那样“逢关抽税,过卡抽厘”了。外国廉价商品依仗特权和低税,在中国市场上大量倾销,排挤中国工业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并获取高额利润。从19世纪50年代起,外国人逐步控制了中国的海关行政权。中国海关不仅不能起抵制外国商品倾销、保护民族经济的作用,反而成为外国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一个重要工具。

3. 实行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

外国资产阶级凭借种种特权,把中国变成了他们倾销商品的市场和取得廉价原料的基



地。这些都是在中国丧失了独立主权因而处于与外国不平等地位的情况下进行的。中国的对外贸易,从1865年开始出现入超,在这以后除1872年至1876年这5年曾一度小量出超外,一直是入超,而且逆差数额越来越大。据统计,1865年至1868年间,每年平均入超750万海关两。1890年至1894年,每年平均入超更增加到3400余万海关两。洋货的大量倾销,使得中国民族企业的产品和传统手工业品受到排挤。直到1883年,毒品鸦片一直占进口货物的首位。

外国资产阶级还直接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开设洋行,带垄断性地经营进出口贸易。到19世纪90年代,这一类洋行已达500多家。其中规模较大的有英国的怡和洋行、太古洋行、沙逊洋行,美国的旗昌洋行,德国的礼和洋行等。它们逐步控制了中国的进出口贸易。

资本—帝国主义列强还利用不平等条约赋予的特权,在中国自由开工厂、办银行、修铁路、开矿山等,获取超额利润,压制中国微弱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1895年以前,外国资本在中国设立的工厂总数约有100多家。1895年以后,由于《马关条约》规定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办工厂,外国资本家争先恐后地涌向中国投资。1895年至1913年间新设立的外资大型厂矿就有130多家。其中英国最多,其次是日本、德国、俄国、美国。外国资本家经营的工厂资本雄厚、规模大、技术先进,民族资本家经营的企业无力与之竞争。

值得注意的是,外国在中国的投资,很大部分并非由国外输入中国,而是利用战争赔款等方式掠夺中国。

4. 操纵中国的经济命脉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中国不可能在独立的基础上与外国发生经济往来。帝国主义列强同中国发生经济关系,不是为了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而是为了控制中国的经济,为自身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

在中国的近代工业中,外国资本很快形成了垄断地位。1913年,外国资本占煤矿投资总额的79.6%,占新式采铁和冶铁企业投资总额的100%,并且控制了41.2%的纱锭和49.6%的布机,使中国民族工业难以独立发展。

帝国主义列强不仅勒索中国的赔款,而且强迫中国举借外债来偿付这些赔款。它们还通过贷款,来支持中国反动政府镇压人民革命。中国政府举借外债,主要是以关税和盐税为担保的。这两项收入,是中国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清政府的这两项税收每年约4000万至5000万两,大部分用于偿付外债,自己只能得到一点“关余”、“盐余”。帝国主义列强直接控制了这两项税收,就等于扼住了中国财政的咽喉。

外国资本在中国设立的银行,是它们对中国进行资本输出的枢纽。外国在中国开设的第一家银行是1845年进入中国的英国丽如银行(又称英国东方银行)。以后陆续开办或在



中国设立分行的重要外国银行,还有英国麦加利银行、汇丰银行,德国德华银行,日本横滨正金银行,俄国华俄道胜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美国花旗银行等。这些银行不仅经营存款、汇款业务,而且进行商业投机、工业铁路矿山投资、高利贷贷款、发行纸币、操纵汇价等。它们凭借各种特权及雄厚的金融实力,逐步地控制中国的财政金融,成为列强对华经济侵略的中心。

帝国主义列强还控制了中国的现代交通运输业。中国境内的铁路绝大部分由外国资本经营。1911年,全国9 618.1公里铁路中,由外国控制的达8 952.5公里,占93.1%。而中国自主修筑的铁路只有665.6公里,仅占6.9%。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对中国铁路的控制,不仅攫取巨额利润,获得铁路沿线的许多经济权益,而且还由此从政治上、军事上取得对这条铁路及其沿线地区的控制权,确立和扩大自己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与此同时,外国资本还控制了我国沿海和内河的主要航道的航运业。据海关报关,在各通商口岸进出的中外轮船的总吨位中,1877年,中国占36.7%,外国占63.3%;到1907年,中国只占15.6%,外国占了84.4%。1911年长江航线轮船吨位中,外资的太古、怡和、日清三个轮船公司就占了83.8%,而中国的轮船招商局仅占16.2%。至于远洋航线,则几乎全部为外国轮船公司所垄断。

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不仅阻碍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而且对中国的农业经济也造成严重破坏。由于外国向中国倾销过剩农产品,中国的一些传统出口农产品如茶叶、生丝等遭到打击,不仅在国际市场上失去了销路,在国内市场上也遭到外国同类产品的排挤。同时,外国商人依仗特权,低价收购中国农、副产品作为其工业生产的原料,如生丝、茶叶、棉花、大豆、烟草、羊毛、皮革、猪鬃等,还通过垄断价格和工农业产品“剪刀差”进行不等价交换,获得超额利润。这一切,加上中国封建地主残酷剥削,导致了中国传统农业的萎缩和衰败。

总之,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使中国在经济上也丧失了独立性。中国被纳入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成了西方大国的经济附庸。除了沿海、沿江少数城市的经济得到畸形繁荣以外,中国广大地区特别是农村的经济都濒临破产。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的联合统治,导致了近代中国经济的落后和人民的贫困。

四、文化渗透

帝国主义列强在对中国实行军事侵略、政治控制、经济掠夺的同时,还对中国进行文化渗透。其目的是宣扬殖民主义奴化思想,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摧毁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1. 披着宗教外衣,进行侵略活动

帝国主义的文化渗透活动,有许多是披着宗教外衣,在传教的名义下进行的。一部分西方传教士积极参与了对中国的侵略活动。比如,1832年德国基督教传教士郭士立曾受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遣,以传教为掩护,在中国沿海进行过长达几个月的间谍侦察活动,刺探搜集大量军事情报,并竭力鼓吹对中国发动武装侵略。鸦片战争期间,他不仅担任英军陆军总司令的翻译,在英军占领浙江定海县时担任民政官,还参与了中英《南京条约》的起草和谈判。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在北京的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向俄国公使和英法联军提供了有关清军在大沽口的设防情况和详细的北京地图。在1860年法国强迫清政府订立中法《北京条约》时,担任翻译和文件起草的法国传教士孟振生甚至在条约的中文文本中,私自添上条约的法文原本上所没有的“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土地,建造自便”的字句。外国传教士由此获得了在中国各地城乡租买土地和盖房的特权,为外国教会在中国内地霸占地产、遍设教堂提供了根据。

19世纪60年代后,外国传教士大批来到中国,并进入内地、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他们中的一些人,采用欺骗讹诈、强迫捐献、压价购买、强占垦地等手段霸占土地,建造教堂,剥削佃户,出租房产。有的还包揽词讼,包庇教徒中的不法分子,或者强迫中国教民抛弃中国传统礼俗,甚至公开干涉中国内政。这些传教士从事的不法活动,激起了中国人民的义愤和反抗。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各地群众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此起彼伏、连绵不断,并不是偶然的。

2. 为侵略中国制造舆论

外国教会势力还利用宣传宗教和西学的名义,为帝国主义侵略制造舆论。他们在中国办报纸、杂志,翻译出版各种书刊。较早的外文期刊是《中国丛报》(1832—1851年)和《北华捷报》(1850—1864年,后改名《字林西报》)。这些报刊基本上反映了当时外国侵略者对中国的态度和要求。基督教在中国设立的最大的出版机构是广学会。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主持广学会的指导思想是“争取中国士大夫中有势力的集团,启开皇帝和政治家们的思想”,也就是说,要影响中国的政治方向。广学会发行的刊物《万国公报》,在介绍西方史地、政治、文化的同时,也宣扬殖民主义奴化思想。如该刊主编、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发表《印度隶英十二益说》,竟然鼓吹英国统治印度有12条好处,主张把英国的殖民统治搬到中国来,即“本昔之治印者,一一移而治华”。广学会翻译出版的书籍,也常常美化帝国主义侵略。如李提摩太在他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一书序言中说,“泰西各国素以爱民为治国之本,不得不藉兵力以定商情”,“然闭关开衅之端则在中国,故每有边警,偿银割地,天实为之”。



帝国主义者为了制造侵略有理的舆论,还大肆宣扬“种族优劣论”和“黄祸论”即中国威胁论。他们攻击诬蔑中国人是愚昧落后的“劣等民族”,应该接受“优等民族”白种人的开导和奴役。19世纪末,欧美帝国主义者还炮制了所谓“黄祸论”。1895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甚至亲自构思了一幅《黄祸图》,让画家克纳科弗斯画成油画送给俄国沙皇。西方还出现了一批关于“黄祸论”的文章和专著。英国人邦德在《我们在中国的一份责任》一书中竟说,“一旦千百万中国人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时,将给西方文明带来灾难和毁灭”,“将会重演过去哥特人、汪达尔人蹂躏罗马帝国的悲剧”。他们宣扬中国人等黄色人种对西方白色人种构成威胁,企图以此论证西方列强侵略、压迫中国有理。但是,与他们的主观愿望相反,帝国主义的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抗,刺激了中国人民的觉醒,促使他们投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



第三节 中华民族的觉醒与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和历史任务

一、中华民族的觉醒

毛泽东同志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①近代中华民族的觉醒,就是在“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中逐渐萌生和发展起来的。从严格意义上讲,近代中华民族的普遍觉醒,应该以1895年甲午战争的惨败为起点,在整个鸦片战争时期,中国还没有完整意义上的民族觉醒,至多仅仅是部分中国人在开始觉醒。但是,任何事情的发展都有一个历史过程,可以说,如果没有鸦片战争时期部分中国人民的开始觉醒,也就不会有甲午战争以后普遍的民族觉醒。

鸦片战争后开始逐步变动,产生了民族意识的觉醒,其表现和过程是:

(1)“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和早期维新思想产生:林则徐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魏源编辑了《海国图志》,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主张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以期国家富强来抵御外国侵略,开创了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先河。洋务运动中有马建忠、王韬、郑观应等的早期维新思想,主张变革封建专制制度。

(2)救亡图存与振兴中华的口号喊出:甲午战争后,中国人民民族意识开始普遍觉醒。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75页。



严复的《救亡决论》喊出了“救亡”口号,康有为亦要求中国人发愤自救。孙中山在兴中会成立时喊出了“振兴中华”的时代最强音。

(3)近代以来无数志士仁人就是在怀着强烈危机感和民族意识下,在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大旗下探索挽救中华民族的道路的。

二、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和历史任务

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矛盾,呈现错综复杂的状况。其中有中华民族与资本一帝国主义的矛盾,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各集团派系的矛盾,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争夺权益的矛盾,等等。在这些社会矛盾中,占支配地位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两对主要矛盾及其斗争贯穿整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始终,并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变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中国近代社会的两对主要矛盾是互相交织在一起的,而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是最主要的矛盾。帝国主义勾结、扶持封建势力作为它们统治中国的支柱。除了帝国主义割占的地区和直接管理的租界、租借地以外,它们主要是通过中国政府当局和各地的官僚、军阀来统治中国人民。

一般来说,当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时,中国内部各阶级,除一些叛国分子外,能够暂时地团结起来进行民族战争去反对帝国主义。这时,民族矛盾特别尖锐,阶级矛盾暂时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例如,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义和团反帝运动,都有过这种情形。而当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反动统治阶级结成同盟,用战争以外的形式共同压迫中国人民,尤其是封建主义统治特别残酷的时候,中国人民往往采取国内战争的形式去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同盟,而斗争的矛头主要直接地指向中国的封建政权,这时阶级矛盾就上升为主要矛盾,民族矛盾退居次要地位。例如,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辛亥革命,就是这种情况。当国内战争发展到从根本上威胁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时候,帝国主义往往直接出兵,镇压中国人民,援助中国的反动派。这时,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完全公开站在一条战线上。例如,太平天国后期清政府向外国侵略者“借师助剿”共同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属于这种情况。

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和演变,是上述两对主要矛盾互相交织和交替作用的结果。近代以来伟大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主要矛盾的基础之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

三、两大历史任务及其关系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除了继续遭受残酷的封建压迫以外,更遭受了外国帝国主义势力



残暴的民族压迫。亡国灭种的阴影笼罩在中国人的心头。近代中国人民的斗争,主要是以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为出发点的。

近代以来,世界上的帝国主义国家,几乎都曾经欺凌过中国;而近代中国的反侵略战争,从1840年反对英国侵略的战争直到抗日战争以前无不以中国失败、被迫接受丧权辱国的条约而告终。其根本原因,正如毛泽东所说:“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正因为如此,为了使中国在这个世界上站起来,为了使中国人民过上幸福、富裕的生活,就必须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联合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就必须改变中国经济技术落后的面貌,实现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富裕。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的这两大历史任务,就是这样被历史地提出来的。无数的仁人志士,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正是为此而进行了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斗争。

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这两个任务,是互相区别又互相紧密联系的。由于腐朽的社会制度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阻碍着经济技术的进步,必须首先改变这种社会制度,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才能为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创造前提,开辟道路。因为不经过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就不可能推翻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反动统治,改变它们控制中国经济财政命脉,利用特权向中国大量倾销商品和资本输出,压迫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的局面;就不可能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和专制政治制度,解放农村生产力,改善农民的生活,扩大民族工商业的国内市场;就不可能达到民族的团结,社会的稳定,从而集中力量进行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现代化建设,以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富裕、幸福。

近代以来,一些爱国人士提出过工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等主张,并为此进行过努力,对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在民族不独立、国家不统一、人民无权利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这些主张并不能从根本上给濒临危亡的中国指明正确的出路。由于这些良好的愿望在实践中不断碰壁,他们中的许多人终于抛弃了这些幻想,毅然走上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斗争道路。

怎样才能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必须首先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因为帝国主义列强决不会自动放弃在中国攫取的特权,封建主义势力也决不肯自动放弃自己控制的政权,所以,以改良的方式是不可能改变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联合统治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的,近代中国曾有不少人希望通过改良的途径挽救中国的危亡,如维新变法运动以及立宪运动等,但统统行不通。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等,也是在进行改良的努力归于失败、对当权者幻想破灭的情况下,才走上革命道路的。

事实上,只有通过革命争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以后,中国人民才有可能集中力量进行



现代化建设,逐步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实现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富裕,从而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使无数爱国志士和革命先驱者不惜生命追求的理想真正成为现实。



思考题

1. 帝国主义的入侵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2. 近代中国进行的反侵略战争具有什么意义?
3. 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和历史任务是什么?



第二章 旧式农民运动与封建王朝的自救



第一节 太平天国起义与农民运动风暴的起落

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民生活更加困苦。由于外国资本一帝国主义的侵入和掠夺,再加上清王朝专制统治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人民被迫走上了反抗的道路,太平天国起义便是其中的代表。

一、太平天国起义爆发的社会背景

鸦片战争后社会危机加深,矛盾日益激化:

1. 清政府为了支付赔款,拼命搜刮百姓

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为支付对列强的巨额赔款,同时也为了弥补财政亏空,清政府加重了赋税的征收科派。各级官吏在征收钱粮时往往浮收勒扣,横征暴敛,农民的负担更为加重。正如天地会的《万大洪告示》所说:“天下贪官,甚于强盗,衙门污吏,何异虎狼”,“民之财尽矣,民之苦极矣!”

2. 鸦片输入引起白银外流、银贵钱贱

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的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逐渐解体。鸦片贸易在战后进一步泛滥,白银外流更加严重,导致银贵钱贱,又额外增加了农民的负担。

3. 土地兼并加剧,地租剥削率日高

老百姓“昔日卖米三斗,输一亩之课而有余;今日卖米六斗,输一亩之课而不足”。田赋负担实际增加一倍以上。这些负担归根到底,仍然落到了农民的头上。

4. 人民反抗彼伏此起。由于残酷的压迫和剥削,迫使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群众走上反抗斗争的道路。1842年至1850年间,全国各族人民的反清起义在百次以上。清政府调兵各处镇压,但群众斗争彼伏此起,酝酿着更大规模的反抗。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就是在这种



情况下爆发的。

二、金田起义与定都南京

1. 洪秀全反清革命思想的形成

洪秀全(1814—1864)于1836年去广州应试不中,得基督教士梁发编《劝世良言》,1843年最后一次应试不中后,阅读此书,开始拜上帝。1844至1846年,洪秀全、冯云山传教到广西,洪秀全在1845至1846回到广东教书、传教,他撷取原始基督教义中反映下层民众要求的平等思想和某些宗教仪式,从农民斗争的需要出发,加以改造,创立了拜上帝教,并利用它发动和组织群众。著《太平诏书》,后又将《百正歌》、《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合编而成为宣传拜上帝教教义。

洪秀全、冯云山在广西领导信徒捣毁神像和庙宇,打击了封建神权,但也遭到了当地地主团练的阻挠和镇压。1848年1月,冯云山被捕,关进桂平县监狱,同年10月,被拜上帝会营救出来。拜上帝会在营救冯云山的斗争中壮大了力量,逐渐形成了由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等人组成的领导核心。

2. 金田团营与金田起义

大约在1850年6月,随着起义时机日益成熟,洪秀全便发布总动员令,号召各地会众于当年秋天到桂平金田村参加“团营”。金田团营,就是把各路起义者聚集到金田。咸丰帝为了稳定广西政局,先后任命向荣为广西提督、林则徐复为钦差大臣赶赴广西前线。可是,林则徐于1850年11月病卒于广东普宁县途中,咸丰帝只得改派李星沅为钦差大臣,前往广西进行镇压,起义军大败清军。

1851年1月11日,起义军庆祝洪秀全三十八岁生日。洪秀全率众在金田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蓄发易服,起义军称太平军。洪秀全发布五条简明的军纪:“一、遵条命;二、别男行女行;三、秋毫莫犯;四、公心和雠,各遵头目约束;五、同心合力,不得临阵退缩。”

3. 定都天京

(1) 攻占永安与永安建制

1851年9月中旬,太平军东进平南,在官村击溃向荣所部,乘胜前进,于25日攻占永安州(今蒙山县),首次占据了城市。

在永安期间,太平军进行休整补充,并从军事、政治等方面加强建设。首先整饬军纪。其次分封诸王。12月17日,洪秀全颁布诏令,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以上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第三,制礼作乐。洪秀



全宣布《太平礼制》，其中规定一套严格尊卑的等级制度和庸俗繁琐的礼仪制度，还颁行了《天历》。第四，清除内奸。杨秀清假托天王下凡破周锡能反叛案件。

1852年6月3日太平军攻克全州。在战全州时，冯云山不幸中炮负伤，不久在蓑衣渡去世。

太平军随即出广西入湖南。不久便攻取岳州（今岳阳），缴获了大量粮食、军火，被俘船员踊跃加入，组成水营。从此，太平军有了一支庞大的水师。这对后来进军长江中下游有重要意义。1853年1月12日，太平军攻克武昌，这是太平军第一次占领省城。入城之后，他们下令“官兵不留，百姓勿伤”，且表明吊民伐罪的志向。广大群众争先捐献财物，以充军用；又纷纷参军，使太平军迅速壮大。

（2）定都南京与军事上的全盛时期

1853年3月8日，太平军兵临南京城下。3月19日，攻破南京外城，斩两江总督陆建瀛；20日克内城，杀江宁将军祥厚。占领南京后太平军把南京改称天京，正式建立了政权。1853年3月29日，天王洪秀全进入金陵，以两江总督衙门为天王府。接着，太平军又攻占镇江、扬州，巩固了天京的外围。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颁布、实行了一系列制度和政策，进行了北伐、西征和天京城外的破围战。到1856年上半年，除北伐战争失败外，太平军在湖北、江西、安徽等战场都取得了很大胜利，又在扬州打垮了江北大营，在镇江和天京击溃了江南大营，从而达到了军事上的全盛时期。

三、太平天国的制度和政策

1.《天朝田亩制度》

《天朝田亩制度》是1853年下半年太平天国颁布的一个纲领性文件。它以解决土地问题为核心，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教各方面的具体政策。它主张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平分土地。“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处不足则迁彼处，彼处不足则迁此处”，“丰荒相通”，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天朝田亩制度》坚决地否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强烈地反映了农民获得土地以摆脱贫困实现温饱和幸福的要求，不愧为农民战争史上最光辉的文献，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

当然，这个文件有其局限性。它提出的分田办法，不是从各地的实际情况出发，而是在纸上作平均主义的规定，在小农经营的水平上，采用简单平分一切社会财富的措施，废除私有制，达到“处处平均，人人饱暖”的理想，只不过是农民小生产者的一种幻想。同时，它将



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起来,强化自然经济结构,遏制甚至取消商品交换,维护划一而低下的生活水平,势必同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背道而驰,会侵害一些农民的利益,挫伤群众的生产积极性,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向前发展。

这一政策虽然没有触动封建土地所有制,但并不排除对封建势力的冲击。在实行这一政策的过程中,地主阶级受到打击,农民生活有所改善,农业生产得到发展,太平军的军事斗争也获得有力支援。

2. 政权建设(军政合一)

建都天京后,太平天国的政权组织进一步完善。

太平天国最高领导为天王,以下设王、侯等爵位,又设丞相、检点、指挥、将军、总制、监军、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等 11 级职官。职官文武不分,军政兼管。

中央行政机构有丞相至将军各级职官,称“朝内官”。但因东王杨秀清执掌军政大权,所以东王府实际上成为总理国务的行政机关,东王府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尚书,是分管各部的主管官员,丞相仅有其名。各级官员有事,除奏请恩赏可直达天王外,军政大事都要先汇总于东王,经他裁处,再行上奏,由天王最后决断。

地方行政分省、郡、县三级。省级官员没有明确规定,多为王侯兼任。郡设总制,州县设监军,都由中央委任,称为“守土官”。县以下设军帅至两司马等职官,这些职官一般由各地公举或由上级官员委派本地乡人担任,叫做“乡官”。从《天朝田亩制度》可以看出,太平天国是仿照其军队编制把居民组织起来的。以五家为伍,设一伍长;五伍为两,设一两司马;四两为卒,设一卒长;五卒为旅,设一旅帅;五旅为师,设一师帅;五师为军,设一军帅,一个军帅管理 13 156 家。每家出一人为伍卒,有警时“杀敌捕贼”,平时则“耕田奉上”。这是一种军政合一的组织。各级乡官的职责是清查户口、安抚难民、征收赋税、供应军需、维持治安、协助作战与管理诉讼等。因此,乡官制度的推行,对巩固政权、稳定秩序与支持作战等方面都起了很大作用。不过,乡官的成分比较复杂,一些地方出现了地主士绅充任各级乡官的现象。

3. 各项政策措施

太平天国在天京曾推行其军队中所实行的一套办法,废除私有制,居民的财物概归圣库,日常生活必需品均由圣库按规定标准供给。居民按性别分别编入男馆、女馆,虽夫妻也不得同居;老弱病残编入牌尾馆。私营商业也被废除了。这些管理城市的办法,显然不符合当时社会的发展趋向,所以不久又只好改变。凡愿经商者,可到圣库领取本钱,开店营业,由天朝发给“文凭”,这种官营性质的商店,也只能维持短暂时间,后来不得不准许私人



经商,并在城外设立买卖街。太平天国把手工业者按其技艺分别编入诸匠营和百工衙,集中生产,统一经营管理。这种在手工业基础上实行官营和平均主义分配的办法,生产者除吃穿外别无报酬,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妨碍生产者积极性的发挥,因而不可能长期推行下去。1855年初,太平天国允许天京居民恢复家庭生活,承认私人经营工商业,天京的社会组织和生活秩序逐渐复原了。

在妇女政策方面,《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妇女与男子同样可以分得土地。在思想文化领域,太平天国对以孔学为中心的封建文化进行猛烈冲击。太平天国对外关系政策从主流方面看,太平天国坚持独立自主,反对外国侵略,发展正当贸易,禁止贩卖鸦片,其外交政策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是难能可贵的。

4. 洪仁玕与《资政新篇》

1859年4月,早年即参加拜上帝会活动而后没有赶上起义队伍的洪仁玕,自香港经广东、江西、湖北到了天京。洪秀全大喜过望,封洪仁玕为干天福。洪仁玕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根据所了解的情况,结合在香港等地学到的西方文化,于当年冬提出一个统筹全局的施政纲领《资政新篇》。《资政新篇》共分用人察失类、风风类、法法类、刑刑类四个部分,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由于这个政纲本身脱离了当时从事武装斗争和发动农民群众的实际状况,加上太平天国辖地狭小又很不稳定,而且处于紧张的战争环境中,缺乏物质条件,未能得到将领们的理解与支持等原因,所以无法施行。不过,这个政纲表现出明显的资本主义色彩,符合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具有进步意义;它也反映了洪仁玕和洪秀全向西方学习、不断寻找真理的精神,对后人是有启迪作用的。洪仁玕的《资政新篇》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改革和对外关系等方面都提出了效法西方的主张,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符合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体现了鲜明的时代性。

四、太平天国运动及各地农民起义的失败

1. 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

(1) 太平天国政权的蜕变与天京事变

太平天国政权的蜕变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军事上的胜利并不意味着政权的巩固,相反,起义队伍中的各种矛盾和弱点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了。在太平天国内部,成分日益复杂,有不少地主、士绅、胥吏、商人以及游民、溃勇等被卷进来。其中有些是暗藏的敌对分子,有些是随风转舵的投机分子,还有相当多的人是被迫参加的。太平天国的绝对平均主义理想,无论在农村



还是城市中都没有且也不可能获得实现,封建的生产关系虽然受到某种程度的冲击和破坏,但仍旧被保留下来并重新恢复。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权,就不可避免地具有封建的属性,而且这种封建性随着形势的发展而日益浓厚。

建都天京后,太平天国领袖们的思想作风发生了变化。起义初期那种“敝衣草履,徒步相从”的质朴的思想作风多被抛弃,代之而起的则是对权利名位和奢侈生活的追求。进入南京后,太平天国领袖们生活上的奢侈腐化已经相当严重。洪秀全进入天京后,大兴土木,营造天王府,从此,他深居简出,安富尊荣,严格等级关系,讲究繁复礼仪。杨秀清生活同样奢侈,其所建东王府极其豪华,每次出巡时,仪仗队多达1 000多人,极尽铺张之能事。太平天国领袖们之间的关系逐渐疏远,洪秀全僻处深宫,把许多精力用于宗教神学的著述,脱离了斗争实践,脱离了广大群众。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等各自通过家族、亲戚、部属等关系,结成自己的集团,并各自控制一部分军队。杨秀清因掌握了大部分军政实权,所以“东府集团”势力最大。这些集团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日益尖锐。1856年月,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发生了公开的分裂。

“天京事变”

洪、杨矛盾激化。杨秀清有出色的政治和军事才能,太平天国起义前期能够取得那样巨大的发展,是和他的领导分不开的。但是,随着起义的发展和个人权势的上升,杨秀清骄傲专横的倾向日益严重地表现出来,洪秀全不愿做个有名无实的天王,要求摆脱“天父”代言人杨秀清的钳制,大权独揽,使太平天国成为真正的洪氏天朝。韦昌辉表面上遵从杨秀清,背地里则欲夺其权。石达开也雄心勃勃,不甘居人下,尤其对杨秀清的专横跋扈积怨在心。杨秀清的专横,扩大了他与洪、韦、石、秦等的矛盾。1856年8月至9月间,江南大营被打垮,天京被包围的形势暂时解除,杨秀清乘机进一步扩大个人权势,“逼天王到东王府封其万岁”。洪秀全虽然答应了杨秀清的要求,但立即密令在江西督师的韦昌辉、在湖北督师的石达开迅速返回天京。

韦昌辉对杨秀清长期怀有不满情绪,但表面上却对杨阿谀逢迎,唯命是从。在接到洪秀全的密令后,韦昌辉立即率领心腹部队3 000多人于9月1日深夜赶到天京,包围了东王府,次晨将杨秀清及其眷属杀死。接着天京城内发生混战,太平天国优秀将领和战士两万人死亡。经过这场屠杀,韦昌辉控制了天京,独揽军政大权,在天京造成恐怖局面。

9月中旬,石达开从湖北赶到天京。他回到天京后,责备韦昌辉不该滥杀无辜。韦昌辉又企图杀死石达开。石达开闻讯后连夜逃往安庆,他在天京的一家老小全部被韦昌辉杀害。于是石达开调集在安徽的部队,进驻宁国附近,要求洪秀全惩办韦昌辉。韦昌辉的屠杀和专擅横暴激起了天京广大将士的愤怒。洪秀全接受将士们的要求,于11月初杀死了



韦昌辉及其心腹 200 多人,并命人将韦昌辉首级送往宁国府,迎石达开回京辅政。

11 月底,石达开回到天京。然而,由于杨秀清专权与韦昌辉屠杀的消极影响,洪秀全对石达开深存戒心,在任命他理政的同时,“不授以兵事,留城中不使出”;还封自己的哥哥洪仁发为安王、洪仁达为福王,对石达开加以挟制。石达开被迫于 1857 年 6 月离开天京,率部独立作战。石达开在前往安庆的途中,向全军发布淳谕,诉说洪秀全对他重重生疑忌,鼓动将士跟他出走。不久,洪秀全削去两位哥哥的王爵,给石达开送去一道义王金牌,表示尽弃前嫌,并附上合朝文武求援表章。可是,石达开置之不理。10 月,他从安庆到江西,继续扩充部队,致有太平军精锐部队约 20 万人随他远征。石达开率兵从安庆出发,从江西转入浙江、福建,复经江西至湖南、广西,虽然队伍有所扩大,却离主战场越来越远。这就不能不引起广大将士的怀疑与反对。1863 年 5 月,石达开在四川大渡河紫打地(安顺场)陷入清军包围,屡战失利,伤亡惨重,部下只剩下 7 000 余人,粮食断绝。石达开走投无路,自带五岁的儿子石定忠、宰辅曾仕和等人入清营,希望以停止最后的抵抗来保全残部。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他的余部 2 000 余人被清军于一夜之间屠杀殆尽,其余已经遣散的也陆续被杀害。石达开本人被解赴成都凌迟处死,“临刑之际,神色怡然”,“辞气不卑不亢,不作摇尾乞怜之语”^①。

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分裂,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它破坏了内部的团结,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损伤了元气,丧失了乘胜歼灭敌人的有利时机。而清政府方面则借机纠集一切反动力量进行反扑。太平天国形势急转直下,1856 年底,武昌、汉阳重陷敌手,随后江西大部分地区也被清军攻占。清军重建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并于 1857 年 12 月攻陷镇江,围困天京。1858 年 5 月,九江太平军守将林启容率部 1.7 万余人与清军进行激烈战斗后全部壮烈牺牲。

(2) 清政府与列强的联合镇压与天京陷落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不久,钦差大臣向荣率军 1.7 万余人尾追而至,在天京城东孝陵卫建立江南大营;钦差大臣琦善亦率直隶、陕西、黑龙江马步各军 1.7 万人,于扬州城外建立江北大营。两个大营互相呼应,且不断增兵,竭力扼制太平军向东、向北发展,并伺机夺取天京。

鉴于八旗、绿营不足恃,清廷饬令大江南北各省在籍官绅举办团练,组织地主反动武装。曾国藩所办湘军就是其中之一。曾国藩(1811—1872),湖南湘乡人,生于地主家庭。道光时进士。做京官 12 年。累迁至礼部侍郎,后兼署兵、吏等部侍郎。他与当时的理学大

^① 刘蓉:《复曾沅浦中丞书》,《养晦堂文集》卷六。



师唐鉴、倭仁等订交,提倡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合一的“经世之学”,是封建士大夫阶层中较有代表性的人物。1853年1月,因母丧回家守制的曾国藩奉令帮同湖南巡抚张亮基督办团练,曾与郭嵩焘一同前往长沙。曾国藩主张“团”、“练”分开,齐头并进。“团即保甲之法。清查户口,不许容留匪人”;“练”就是“养丁、清师、制旗、造械”,组成地方性的地主武装。曾国藩以罗泽南的湘勇为基干,略仿明戚继光的成法,募练了一支不同于绿营制度的军队——湘军。湘军薪饷普遍高于绿营,曾国藩还强调治军须“严刑峻法”,建立严密的稽查制度,以肃军纪。这样,湘军的战斗力较绿营、八旗有显著提高,逐渐发展成为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的主要依赖力量。

1862年5月,曾国荃所部湘军进扎雨花台,围攻天京。这时,苏南战局日趋恶化。湘、淮军和“常胜军”占据太仓、昆山,围攻苏州。苏州陷落后,无锡随之丧失。在浙江地区,1862年5月,英、法两国出动军舰6艘、部队近400人,与清军一道进犯宁波。太平军奋起抗击,杀伤一些中外敌人,终因力量薄弱,随即转移,退向余姚等地。列强攻陷宁波后,组成“中英混合军”与“常捷军”,又从上海调来华尔所带的一部分“常胜军”,伙同清军继续攻打太平军。江浙战场的瓦解,使天京成了一座孤城,内缺粮食,外无援兵,能够作战的太平军仅数千人。1863年12月中旬,李秀成自丹阳回到天京,建议“让城别走”,遭到洪秀全的拒绝。可是,洪秀全并没有采取积极的防御措施,一味迷信天父上帝。1864年6月1日,洪秀全病逝,长子洪天贵福继位为幼天王。7月19日,湘军挖地道埋炸药轰塌城墙20多丈,蜂拥冲入城内,大肆烧杀抢掠,太平军将士同敌人展开短兵相接的肉搏战,决心同城共存亡,壮怀激烈,宁死不屈,连曾国藩也惊叹其“实为古今罕见”。他们用自己的鲜血,为太平天国史写下了十分悲壮的一页。

天京的陷落,标志着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尽管如此,分布在大江南北的数十万太平军余部,仍然不屈不挠,浴血苦战。江北的太平军则同捻军结成一体,又坚持了四年之久的艰苦斗争,至1868年8月才告失败。

(3) 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原因与历史意义

19世纪50—60年代的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历史上单纯农民战争的最高峰。当时,成千上万的贫苦农民及其他劳动群众,集结在太平天国的旗帜下,英勇奋战,占领了中国南部大片土地,先后攻克400多个城市,势力扩展至18省,坚持战斗14年。太平天国英雄们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军事和政治制度,提出了自己的斗争纲领与政策,还进行了经济和文化等各项建设。这次运动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影响之深远,是以往任何一次农民战争所不及的。

失败原因:从主观方面看,由于历史条件和阶级地位的限制,太平天国无法克服农民阶



级自身的弱点。

第一,制定不出坚定正确而切实可行的纲领。太平天国运动未能得到科学的阶级斗争理论的指导,致使领导者难以正确地根据中国社会各个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这次运动的态度,分清真正的敌友,制定相应的政治纲领。他们提出的《天朝田亩制度》,固然反映了农民的土地要求,却是无法实现的绝对平均主义空想图案,而且不能推动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只能停滞在分散的小农经营的水平上。他们提出的《资政新篇》,虽有进步意义,但也缺乏施行的条件。正因为他们不是新的生产方式的代表者,无法建立新的社会经济制度取代旧的社会经济制度。他们在占领过的地方都没有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故其政权就不能长久存在。

第二,不能长期维持严明的纪律。起义之初,太平军的纪律确实非常严格。随后,由于新成员的大批加入,队伍庞杂,缺乏必要的训练与改造,纪律逐渐遭到破坏,出现了扰害人民的现象。随着斗争的发展,将领中有些人滋长了贪污腐化的作风,或者出现各自为政的倾向,恶化了同广大群众的关系,削弱了自身的力量。他们在政治上也不能团结一致,为了争夺最高统治权力而发生的天京变乱,造成无可挽回的严重后果。苏南等地一再出现的叛乱事件,也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这样,他们就无法集中自身的力量去战胜凶狠的敌人。

第三,缺乏用科学方法总结经验以指导实践的能力。自金田起义之后,太平军如果采取积极进攻方针,就能不断取得胜利;倘若停留不前,即会遭受敌人围攻。这些斗争的经验教训,太平天国领导者不能用科学方法进行总结,制定自己的政策和策略,因此,不可避免地出现失误。当1853年全国人民群众斗争积极性空前高涨、清朝统治阵营一片混乱时,他们没有抓住机会全力北伐,从而失去推翻清廷的大好时机。在1860年至1861年再次西征时,他们也未能坚持到底,以致会师武汉、救援安庆的战略功败垂成。

第四,未能认清列强的侵略实质。太平天国领导人看不出资本主义列强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无法认识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联合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群众的实质,曾经因为宗教形式的相同,把以信奉基督教为招牌的外国侵略者误当做朋友,想不到这些“洋兄弟”竟会帮助“清妖”来反对自己,结果吃了大亏。

这就深刻地证明,在中国已经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期,“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就必然不能胜利”^①。就客观方面说,太平天国的失败则是因为中外敌人互相勾结,狼狈为奸。以满洲贵族为主体的清政府,对内除调动其中央与地方的庞大常备军外,还作出授予地方军政实权的重大让步,换取以曾国藩等为代表的汉族地主阶级的全力支持;对外

^①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5页。



则以出卖国家主权为代价,获得资本主义列强在军事与经济上的各种援助。中外反动势力串通一气,变成强大的敌人。太平天国运动就是在中外敌人的联合镇压下失败的。

历史意义:首先,这次运动猛烈冲击和极大动摇了清朝的封建统治。太平军曾经驰骋大江南北,锐不可挡,他们所到之处,摧毁清朝的统治机构,诛杀贪官污吏,惩办地主士绅;并建立自己的政权,对抗清朝的反动统治。他们提出反映农民要求的土地纲领,否定封建土地制度,而且支持农民反抗地主压迫和剥削的斗争。他们还冲击封建文化,进行自身的文化建设。在太平天国运动的沉重打击下,清政府摇摇欲坠,一直未能出现稳定的局面。

其次,这次运动迎头痛击了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太平天国反对民族压迫,主张各国平等往来与友好互助,维护民族尊严,禁止鸦片贸易,坚决拒绝列强的侵略要求,英勇抗击其武装进犯,同外国侵略势力展开激烈的斗争,使列强从清政府取得的权益不能立即到手。列强惊呼:太平天国的正义斗争,表现了中国人民反对列强侵略的英雄气概和爱国精神。

最后,这次运动推动了中国近代人民革命斗争的发展。太平天国的反抗精神和战斗业绩,在中国人民中间起了巨大的教育和鼓舞作用,提高了广大群众斗争的信心与勇气,激励他们奋起反抗国内外敌人,影响非常深远。义和团的一位首领张德成曾自诩为洪秀全,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以“洪秀全第二”自命。他们都从太平天国事业中汲取力量,立志像太平天国英雄们那样,奋起反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国内封建统治。太平天国的经验教训,对此后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继太平天国之后,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又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

2. 太平天国时期的各族人民起义

太平天国运动前后,南方有闽南小刀会起义、台湾天地会起义、闽中红钱会起义、广东天地会起义、升平天国起义、延陵国起义、上海小刀会起义、宁波双刀会起义、诸暨莲蓬党起义、平阳金钱会起义;北方有声势浩大的捻军起义;西南有云贵各族人民起义;西北有陕西回民起义、甘肃回民起义。这些起义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虽然都以失败而告终,但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第二节 清政府的自强运动

鸦片战争后,严重的民族危机迫使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前赴后继,进一步探求自强救国的方略。清朝统治阶级就如何解决内外矛盾问题,形成了一个较为开明的洋务派,在洋务派的倡导下,从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在中国发生了一场以学习和引进西方先进科学



技术、举办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编练新式海陆军、培养新型近代人才为主要内容,以富强为目的,影响中国近代命运的洋务运动,史称“同光新政”。

一、洋务运动发生的历史背景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凭借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种种特权,逐步扩大和加强了对中国的侵略,不但导致中国主权进一步丧失,而且经济上日趋半殖民地化;民族危机的加深、西方文化的冲击和社会经济的变化,带动了社会思想意识的显著变化。了解学习西方,“师夷长技”,变革拯救中国成了有识之士的共识;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在进一步寻求西方富强奥秘的基础上,倡言学习西方,改革现行经济、文化、军事及政治制度;英法联军锐利无比的“火器”及“直入京城、要挟狂悖”的态度,强烈地刺激了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官僚,促使他们萌生了学西学、制洋器以图自强的想法;“中外合好”局面为洋务运动的开展提供了客观可能性。

在“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口号下,从19世纪60年代初开始,由进步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鼓吹于下,一部分当朝官僚倡导于上,以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引进机器生产为中心内容的洋务运动展开了。

二、洋务派及其主要活动

1861年1月,清政府设立了专门处理与外交相关事务的中央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拉开了洋务运动的序幕。前期的洋务派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

一是洋务派官僚,他们是洋务运动的政治支柱和洋务企业的主办者。这些人在中央有奕訢、文祥等满族贵族,在地方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汉族大吏。二是洋务理论家,他们师承林、魏,要求“师夷长技”,代表人物有冯桂芳、王韬等。19世纪70年代中期后,随着洋务重心的转移,一批要求发展民族工商业的买办、商人及新知识分子也鼓吹洋务,代表人物为郑观应、朱其昂、唐廷枢、马建忠、盛宣怀等。

洋务运动是在“求强”、“求富”的口号下展开的。以19世纪70年代中期为界,洋务运动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主要举办军事工业以求强,后期主要举办民用工业以求富。

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洋务派举办的洋务事业归纳起来有三方面:

1. 兴办近代企业

洋务派首先兴办的是军用工业。19世纪50年代,湘、淮军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购置和仿造了一些西式武器,并聘请洋人教以洋式操练。在镇压太平军中对洋枪洋炮威力有亲身感受的曾国藩、李鸿章等认识到引进和学习西方军事技术的重要性,开始设厂制造。1890年以前,洋务派在全国各地共创办了20多个军工局厂。其中规模较大的有5个:1865年,曾国藩



支持、李鸿章筹办的上海江南制造总局,是当时国内最大的兵工厂;同年,李鸿章在南京设立金陵机器局;1866年,左宗棠在福建创办福州船政局,是当时国内最大的造船厂,附设有船政学堂;次年,崇厚在天津建立天津机器局;1890年,张之洞在汉阳创办湖北枪炮厂。

由于洋务军事工业的产品不是商品,因此企业只能依赖国家的财政支持方可维持。随着时间的推移,军事企业不断碰到棘手的问题:资金不足,后勤供应落后,原料、燃料缺乏,等等。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洋务派对于向西方学习的认识也较前深入了一步,他们认识到西方的强不仅在坚船利炮,更重要的是他们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作后盾,中国近代军事工业的发展也需要有近代工矿企业和交通运输业的配套支持,洋务派希冀通过办民用工业“分洋商之利”。于是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洋务派在“寓强于富”、“以富求强”的口号下,举办和发展民用工业。从70年代到90年代,洋务派创办了轮船航运业、电线电报业、矿业和纺织业四大类20多个民用企业,其中规模较大的有:

李鸿章1872年兴办的轮船招商局,是洋务派创办的第一个新式交通航运企业,也是第一个官督商办的洋务民用企业;左宗棠1876年兴办的甘肃织呢总局;李鸿章1878年筹办的开平矿务局;李鸿章1880年兴办的天津电报总局;李鸿章1880年筹建的唐山至胥各庄铁路;李鸿章1882年兴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李鸿章、恭亲王1888年兴办的漠河矿务局;张之洞1890年兴办的湖北织布官局,1894年兴办的湖北缫丝局和湖北制麻局,1897年兴办的湖北纺纱官局;张之洞1890年兴办的汉阳制铁局,1891年兴办的大冶铁矿和马鞍山煤矿;还有其他民用工业。这些企业除少数采取官办或官商合办方式外,多数都采取官督商办的方式。其中最重要的官督商办企业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和上海织布局,都是李鸿章筹办或控制的。这些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虽然受官僚的控制,发展受到很大限制,但基本上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企业。

2. 建立新式海陆军

19世纪60年代,京师和天津、上海、广州、福州等地纷纷成立洋枪队,使用洋枪、洋炮,聘用外国教练。李鸿章的淮军、左宗棠的湘军也是用洋枪装备的军队。

1874年,日本派兵侵犯中国台湾,清政府筹办海防之议随之兴起。从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分别建成福建水师、南洋水师和北洋水师,共有舰船六七十艘。其中北洋水师是清政府的海军主力,拥有舰艇20多艘,这支舰队一直归李鸿章管辖。

3. 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

兴办近代工业、训练新军,要有懂得西方先进技术的专业人才。为此,洋务派创办了新式学堂。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30多年间,洋务派创办新式学堂30多所,主要有



三种:一为翻译学堂,如京师同文馆,主要培养翻译人才;二为工艺学堂,培养电报、铁路、矿务、西医等专门人才;三为军事学堂,如船政学堂等。他们在创办新式学堂的同时,还先后派遣赴美幼童及官费赴欧留学生 200 多人。

三、洋务运动的评价

1. 洋务运动没能使中国走上富强道路的原因

1895 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洋务派精心经营的新式海陆军被打垮。此后,洋务活动虽仍在继续,但作为一个思潮及相应规模的实践已不复存在。洋务运动失败了,它没能使中国富强。

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是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之一;封建势力的阻碍是洋务运动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洋务企业自身的封建性也是洋务运动失败的一个原因;洋务运动没能使中国走上富强的近代化道路的主观原因是其领导者及清朝统治集团缺乏近代化意识。

2. 洋务运动的历史意义和教训

洋务运动是清政府内部一部分开明官僚在内忧外患的压力下,试图从军事技术和经济方面改变中国落后挨打局面的一次尝试。虽然其目的是为了镇压国内人民起义,抵御西方侵略,巩固封建统治,开展的结果也没能使中国“民富国强”,但它是近代中国第一次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近代化运动,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它拉开了中国经济、军事和科学技术近代化的帷幕,客观上动摇了封建专制统治。

首先,洋务运动直接促成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其次,洋务运动导致了中国社会阶级结构的新变化;再次,洋务运动冲击了传统的封建观念。

洋务运动的实践表明:只有求得国家的独立,才能从容地实现现代化;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改革开放必须有制度和政权的有力保证;没有成功的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就很难进行。反之,只有单纯的军事、经济改革而没有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改革的配合,也不可能实现国富兵强;人的现代化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现代化的先决条件。



思考题

1. 如何认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意义和失败的原因、教训?
2. 如何认识洋务运动的性质和失败的原因、教训?